

編 者 按

現代中國歷史上發生的重大問題，幾乎都要從五四說起。今年是五四80周年，本欄兩篇文章，是作者深思熟慮、對新文化運動的宏觀研究。

張灝將五四與戊戌(1895-1920)作為一個歷史的連續體加以研究，認為這25年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關鍵轉型時代。文章分析了在這一時期中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變化，全新現代知識階層的產生，以及多方位的傳統中國文化取向危機。1895年以後，知識份子一方面對現實有強烈的沉淪感與疏離感，另一方面對未來理想社會又懷有熱烈的烏托邦期望和政治行動傾向，這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理想主義心態。

金觀濤和劉青峰依據對《新青年》關鍵詞的意義分析，質疑學術界有關新文化運動的本質是所謂全盤反傳統主義的流行觀點。他們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內在動力是中國知識份子常識理性的變遷，即以科學為代名詞的現代常識和以民主為代名詞的個人獨立，取代了傳統的常識和人之常情的位置，從而為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奠定了基礎。因此，新文化運動的實質是中國文化的再次理性化，但它與韋伯所說的西方理性化不同，只是中國文化本身意義和理路中合理性標準的變化，其深層結構不過是一種現代的常識理性。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始終無法擺脫自身特有的理性化模式的鐵籠。